

语用在翻译中的体现

作者：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许菁

【摘要】语用翻译是翻译的一个难点。该文对已经取得的语用翻译研究成果作了简要介绍，同时也对语用翻译研究中出现的重点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关键词】语用；翻译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但当代翻译研究的许多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也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语用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在翻译实际运作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语用问题的影响，因此国内外著名学者对有关语用翻译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而且成果颇丰。因此，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下国内外语用翻译的研究现状以及语用翻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语用与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西方语用学科的独立和我国语用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东西方许多学者致力于语用与翻译的研究，并在语用学界和翻译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在西方，格赖斯、弗斯、列文森、贝尔、格特、哈蒂姆和梅森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语用学和翻译的交界线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在我国，何自然、钱冠连、刘祖慰、曾宪才、刘季春、穆雷、王克非、柯平、叶苗、吴议诚、罗进德、王楚安等学者在语用和翻译的结合研究方面亦有不少建树。下面简要介绍他们的一些研究及观点。

1、国外语用翻译研究

英国语言学家罗杰·贝尔运用功能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翻译的心理语言过程，提出了翻译心理语言过程模式，给翻译的语用过程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哈蒂姆和梅森研究认为跨文化交际中的辩论风格可以与翻译相得益彰。黄子东把二者的研究实质归纳为语际语用学问题，也就是翻译中的语用迁移问题。目前在我国，这类问题似乎少有人研究。随着语用学的最新发展，语用翻译理论近年来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关联理论成为当前指导语用翻译的新论。格特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解释了翻译中的明译与暗译问题。最近，格特也应用关联理论对文学翻译中的暗含信息进行了研究（Ramos, 1998）。除格特之外，奥尔森、卡瓦西克、昂格尔等不少西方学者也应用关联理论对翻译进行了研究。

2、国内语用翻译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也给语用翻译研究增添了不少光彩，在此不一一赘述。先简要介绍一下何自然和钱冠连两位先生的语用翻译观。

关于何自然先生如何看待翻译中的语用问题，我们可以从他在《外语与翻译》1996 年第 2 期发表的“翻译要译什么——翻译中的语用学”一文中一段论述得到答案：“译者在正确认知原文作者的意图的前提下，如果表现原语文化的特征，增



强译著的异域感，则语用翻译主张尽量译出原文的形象和习惯，减少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理解上的困难，译者不妨以照顾译语文化为主，或改换形象，或直接译出意图。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译文无论作什么样的处理，只要它能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它就是一种可行的语用策略，不宜轻易肯定某种处理方式，否定另一种处理方式。”

然而，钱冠连先生的语言翻译观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钱冠连，1997）：（1）他认为，原作者叙述语言中的隐含意图与人物话语的隐含意图必须保留在译文中，而且不能“没收”与取消某个隐含意图，也不必平添一个语用隐喻或将原来语面上的明显示义译为语用隐含；（2）他认为在处理两个隐含意图时必须依靠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智力干涉的帮助与证实；他认为翻译必须忠于原文，不必再一次在前面提及的三项干涉上有所创造，但它必须忠实地按照原文的面貌反映这三项干涉；（3）关于翻译的创造问题，他认为翻译的创造是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下语言符号范围内的创造：忠于原著；不改变作者叙述语言与文学作品中任务话语的隐含意图。他的观点对于文学翻译家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笔者认为忠实于原文固然重要，但在必须传达语用意义时，需综合考虑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种等效。

二、翻译中的语用问题

1、语境与翻译

语用学是对话语如何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换言之，它所研究的不是游离于语境之外的抽象意义，而是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体现出来的具体的意义（何兆熊，1989），即语言的使用者在一定的语境中赋予词语或句子的语用意义。奈达说 *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王宗炎先生也说：“辨义为翻译之本。”这里的“meaning”和“义”都是指原语篇中的词语在其特定语境中的语用意义。由此可见，不了解语境，就无法从事翻译。翻译者必须了解原作语境，否则即可能出错。汉语中“爷”、“妈”、“妹”等在语用学中属于社会指示词的研究范围，当作为亲属称谓词，其意义十分明确，但这些词在特定语境下带有语用意义，这时译者就要注意它们的翻译。例如，汉语中作亲属称谓的“妈”，其所指和内涵都是明显的，容易确定的。当“妈”作为一个构词单位时，跟姓相结合成一个称谓，如“高妈”、“杨妈”等等，在《骆驼祥子》的时代，指佣人、保姆，老舍使用“高妈”等也是这个意思。如何英译呢？三个英译本把“高妈”分别译为 *Kao Ma*(Evan King), *Kao Ma*(Jean James), *Gao Ma*(Shi Xiaoqing); “杨妈”都译成“Yang Ma”。问题是英语中 *ma* 和姓结合并不能表示出“女佣人、保姆”这层语用意义，但有趣的是三个译本把“张妈”分别译成 *Amah Zhang*(Evan King), *Chang Ma*(Jean James), *Nanny Zhang*(Shi Xiaoqing)。Amah 原为印度英语，指女仆，尤指保姆；Nanny，保姆。这两种译法较“高妈”、“杨妈”的英译来说更为贴切（林书武，1995）。我们再看看几位翻译家对唐代诗人王勃的诗句“滕王高阁临江渚”的翻译。

Herbert A. Giles 译为：Near these islands a palace was build by a prince.

北大英语系许渊冲教授译为：By riverside towers prince Teng's Pavilion proud.

滕王阁故址在今南昌市章江门和广润门之间的滕王阁小学附近。当时高阁俯瞰赣江，与西山对峙，突兀碧空，瑰丽奇特，为江南第一胜迹。此阁为唐高祖李渊第22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嬰都督洪州时所建。李元嬰于贞观十三年(639)受封“滕王”，故名滕王阁。诗句“滕王高阁临江渚”写滕王阁所在位置，“江渚”指江中小洲。Herbert A. Giles 对此句的翻译表明：一是对诗句含义理解不深，转移了原诗句的话语中心意义，强调高阁为何人所建，并且“高阁”的含义避而不谈，将“阁”译为“palace”也有些牵强附会；二是对诗句的情景、背景不明，造成译词不确切。实应译为“islets”而译成“island”，“滕王”称号未译，而只泛泛地译为了一



位王子 (a prince)。许先生对诗句理解透彻，熟悉时代背景，用词恰当，即注重了原文的思维内容，又考虑到了语言形式和文体风格，忠实地表达了原文意义。唯一不足的是未将“渚”字含义译出 (李发根, 1997)。因此，要做好翻译，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用吕叔湘先生的话说，译者应是“杂家”，精通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的各个方面。

2、社会文化特征与翻译

如何处理原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距，也是语用翻译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知道，两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思维方式和美学观念也有差异。如果翻译时机械地照搬原文，有时不仅不能保持原文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反而会弄得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甚至歪曲原意。奈达在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曾经指出，除非译者可以断定原作者有意使自己的言语隐讳难懂，否则译者就不宜使信息变得隐讳难懂 (谭载喜, 1993)。因为译者的服务对象是对原语社会文化不甚了解的译语读者，译者有责任把属于原语语言文化环境的产物，用符合译语语用习惯的译文介绍给译语读者，而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举例来说，

英语成语 as drunk as a mouse 与其译为“烂醉如鼠”就不如译为“烂醉如泥”；

as bitter as worm wood 不宜译为“苦如艾蒿”，应译为“苦如黄连”；

还有一些在译语语境中一目了然，或其内在信息被原语读者视作当然的浓缩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读者等诸因素的改变，可能就会变得难懂而需要译者进行语用增补，明示原语的文化内涵或具体内容。我们看以下这段话的翻译处理：

“当然很不容易，”潘经理继续唱独角戏，“可我们省外贸是本行业的大哥大，一定要保住首席地位哦！”

这段话出自广东作家张欣的中篇小说《首席》。“大哥大”在如今的中国常被用来作“居首位者”的代称，但“big brother”没有相同的语用含义，译语读者很难会产生相同的联想。要准确的表达出原意，此句应译为：
“Of course it won't be easy.” Chief Pan continued with his solo performance. “But Guangdong reigns supreme in the foreign trade, and that position we must maintain!” (Translation by Josephine A. Matheus, 1995) 在这里，“我们省”应为“Guangdong”，“大哥大”译为“reign supreme”，“首席”（“大哥大”的同义替换）处理为符合英语习惯的指代替换“that position”。如此一来，译文明示了原文的语用含义，排除了引起误解的因素，使原文信息得以准确传达。

3、言语行为论与翻译

语用学认为，语言的运用都是言语行为。语用学的核心理论是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言内行为（说者通过说话表达字面意义），言外行为（说者通过字面意义表达说话的意图）和言后行为（说者说话的意图可能带来的后果）。吴义诚在 1998 年谈到“语用学家最感兴趣的是言外行为。确保言外行为的力度一致，即表意程度的一致，是语用翻译的一个中心原则。虽然这类言外之力失误对译文的质量不一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译文的读者也不易觉察这类失误，但以翻译的高标准来衡量，我们就不能忽视这类表达“言外之力”的失误。”（何自然、段开诚，1988）这就告诉我们，作为翻译者，必须深刻理解句子意义和语用意义，领会说话者或写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义。O. Henry 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话：

It (New York) has the poorest millionaires, the littlest great men, the haughtiest beggars, the plainest beauties, the lowest skyscrapers, the dolefullest pleasures of any town I ever saw. 照字面意思可译为：这座城市有的是最贫穷的百万富翁，最矮小的伟人，最目空一切的乞丐，最普通的美女，最低矮的摩天大厦，和最令人悲哀的欢乐，比我所见到的任何城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句话谁能看懂呢？只有理解其句子意义和语用含义，才能译出原作真正的意思。因此，根据其语用含义可译为：“这座城市（纽约）里有的是心灵最空虚的百万富翁，人格最渺小的伟人，最目空一切的草包，最使人瞧不上眼的美女，最卑鄙龌龊的摩天大厦，和最令人悲



哀的娱乐，比我见到的任何城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一来，原作的讽刺辛辣意味表现的淋漓尽致（李发根，1997）。但是，语用翻译中，译者不能好心过度，不能一概把原作中蕴涵的意思都为读者说白。这里有一“度”的问题，超过这个度，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效果将适得其反，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如何掌握艺术效果与掌握对读者的吸引力分寸的问题。

三、结语

翻译研究从以严复为代表的纯经验的总结发展到以语言学及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又经历十几年的发展，至今语用学开始全方位、多层次地介入翻译研究，从而在翻译研究的对象、范围、内容和深度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这一突破将更加牢固地确立科学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

[参考文献]

- [1]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1983.
- [2]Gutt, E.,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Basil Blackwell, 1991.
- [3]Nida, E.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4]Searle, J., *Speech Acts*, CUP,1969.
- [5]陈小慰, 翻译中的语用明晰化处理[J], 福建外语, 1997(4).
- [6]何自然, 翻译要译什么— 翻译中的语用学[J], 外语与翻译,1996(2).
- [7]何自然, 语用学概论[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8]何自然, 段开诚.英汉翻译中的语用对比研究[J]. 现代外语,1988.
- [9]何兆雄, 语用学概要[M], 上海外语出版社, 1989.
- [10]黄子东, 语用与翻译研究述评,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3).
- [11]林书武, 国外隐喻研究综观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1).
- [12]谭载喜, 跨语交际[M].漓江出版社,1993.
- [13]吴义诚, 也论翻译中的语用问题[J], 外语研究, 1998(2).

【作者简介】

许菁，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